

图形与话语：利奥塔的弗洛伊德主义^{*}

莫伟民

在批判近代哲学思辨理性主义及其二元分裂这一点上，利奥塔与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可谓志同道合：福柯强调理性与癫狂原本一体，以批判古典时代排斥癫狂的笛卡尔理性主义；德里达凭借“原初书写”和“原初痕迹”，来解构倡导言语与书写之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德勒兹的“感官的逻辑”弘扬一种“彻底的经验主义”，以批判传统哲学的表象主义，而利奥塔则是在理性形而上学和文本主义贬损感性图形而褒扬理性话语的情况下，要把图形从屈从和受贬抑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在本质主义“求同去异”的情况下捍卫“歧异”论题，研究后现代知识状况和后现代文化特征。通常不受学界重视的利奥塔博士论文《话语，图形》，基于弗洛伊德思想立场来讨论图形与话语的关系，旨在批判传统理性哲学追求普遍性、基础性和一致性的理论恐怖主义，批判梅洛-庞蒂现象学的缺憾，为其以后著作阐发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差异说和歧异说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如果不读解这部在利奥塔思想中起着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著作，就难以确切理解和全面把握利奥塔思想从“图形”、“欲望”到“语言”、“语句”、“政治”这样的演绎进程，难以洞悉其后现代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

一、图形与话语

哲学家们往往赋予人体感官不同的作用，并以此来阐发各自的哲学思想和审美理论。“洗耳恭听”的“耳”为知性和理论话语作准备，似乎与理性思维和思辨话语相联系；而“眼见为实”的“眼”总是落在可见的感性图形之上，似乎与感性差异和审美敏感性相关。鉴于传统哲学理论往往忽视甚至贬低“眼”的重要性，利奥塔的《话语，图形》就是要捍卫“看”的感官——“眼”的重要性，要接纳图形，要凸显图形的重要性。因为图形要比话语来得重要，感官要比理性来得重要，看要比说来重要。总之，图形、形式和艺术形象相比于理论话语具有优先权。鉴于克洛代尔认为“眼睛倾听”（Claudel 1946 书题）而把可见与可读、可听、理解等同起来，利奥塔强调看、可见、图形的独特性，否认可见物是一个有待于阅读的文本，因为文本并不具有感性意义上的深度，而可见的一切则包含着意指活动所不能加以把握的根本性的深度和差异。虽然文本与图释、读与看，一直存在于自基督教以来的整个西方思想史和绘画史中，但图释与看（在《圣经》及其各种各样的解释中往往是作为赦免的对象而出现的。西方思想史是理性话语受褒扬而感性图形被贬损的历史。

利奥塔要为“眼”辩护，关注感性的“阴影”（pénombre），要消除几千年来由传统哲学笼罩在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法国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研究”（编号 07BZX 045）、复旦大学“985”工程国家创新基地项目“当代法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编号 05FCZD0010）的阶段性成果。

可感物及其感性经验之上的阴影，捍卫感觉主义的立场。“自柏拉图以来由言语像灰色面纱般投射在可感物上面的阴影，被言语不停地主题化为存在 - 贬损 (un moins-être) 的阴影，其立场只是很少被真正捍卫，因为这个立场被看作是虚假的立场、怀疑论的立场、雄辩家的立场、画师的立场、冒险家的立场、放荡者的立场、唯物论者的立场”。(Lyotard 1971, p. 11) 柏拉图把所谓实在永恒的理念世界与所谓虚妄变化的感觉世界对立起来，从而把感觉主义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鉴于柏拉图理念论否认感性世界及其模仿——艺术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利奥塔则坚持认为具有崇高地位的艺术是对僵硬理性的驳斥，因为艺术意味着图形、欲望、可塑可变和外在性，它对立于话语、理性、僵硬不变和内在性。理性话语的意指具有内在性和时间性特征，而艺术的立场表明象征符号的超越性是图形，是语言空间所无法内在化为意指的外在性和空间性表现。崇高的艺术需要图形。象征符号既可供人思，也可供人看。“真正的象征符号供人思考，但它首先供人‘看’”。(ibid p. 13) 象征符号供人思考这不难理解，难解之谜是它仍有待于被“见”，是它不停地维持为可感的，是存在着一个作为“视域”储藏的世界或一个作为“视觉”储藏的间世界 (entremonde)，整个话语在征服它之前都已衰竭。感性图形就这样显得比理性话语优先和重要。

图形与语言文本的关系究竟如何？两者是否一定是排斥关系？

一方面，利奥塔区分了文本性空间和图形性空间，强调两者的存在论差距，因为这两种意义域分别形成了各自所占据的空间的特有组织结构：前者是字母，后者是线条。文本性空间是记录书写能指的空间，而图形性空间则是展现造型艺术及其所表现者之间关系的空间。书写空间与读者己身的关系是任意关系。“读是听而不是见。”(ibid p. 217) 利奥塔否认可读者的可见性。而图形性线条（色度、颜色）在流动中就展现了多变的意义，线条的图形性力量迫使精神驻足于可感者，图形空间与观者的关系就不是任意的了。利奥塔要从文字中夺回线条，让具有造型空间的图形因素远离理性主义话语把所有对象都封闭在意指领域这样的文化氛围。利奥塔也不在造型意义上来阅读可见者。图形世界的特征就是模糊、无序却真实，而书写世界的特征是清晰、有序却虚假。

另一方面，利奥塔也没有把图形与文本截然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图形处在语言之中，语言从图形获取其动能。虽然人们仅仅是从话语内部才能通向并进入图形，但词语不仅不能表达那个能提供深度的动作性广延，反而还以这种广延为其表达力量的源泉。图像既处于语言外部，又处于语言内部。语言既是分裂者，又是被分裂者。因为语言将可感世界外化为其对立面，因为语言将图形要素内化于被言说的一切 (articulé)。“眼在言语中，因为没有有一个可见者的‘外在化’就没有被言说的语言，但眼仍在语言中，这是因为在作为眼之表达的话语中心处存在着一种至少是动作性的、‘可见的’外在性。”(ibid pp. 13-14) 凭着这双重的外在性，可见者、眼就能应对语言、耳的挑战。“没有任何话语不包含有这种设法要加以打破和恢复的不透明性、这一无穷无尽的深度。”(ibid p. 14) 利奥塔这里所说的“不透明性”，其实就是深不可测、永不枯竭的“图形”。虽然话语有其深度，但这个深度在于话语不仅仅意指，而且还仰仗眼来表达，而表达是有力、有能量、有运动的。话语的深度取决于其对于图形的依赖程度。利奥塔说明了与感性图形相关的外在性、力、有形的空间，如何出现在相关于理性话语的内在性、封闭的意指之中。

利奥塔不能无视诗歌作品中图形因素在话语中的在场、欲望在话语中的在场问题，反对在貌似欺骗性的图形性空间与建立知识的文本性空间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利奥塔发现了一项原则上与图形性空间相联系的、出乎人们意料却源自于欲望的真理功能。话语具有语言符号的结构，能指、所指、被指称者处于“意指和指称这两个坐标轴上”(ibid p. 283)，而图形的三个等级（图像、形式和母型），运用可见性标准划分，则是物体的图像、可见者的形式、更深层的只可能接近却不能被看

见的形态。利奥塔发现各个图形领域与各个话语坐标轴之间存在一种可能的衔接：可见者是指明活动据以在其上把对象提供给话语的那个轴。“因而，图形景象和话语景象这两个景象的连接点就应该是图形—图像或被指明者”。(Lyotard 1971, p 283)事实上，任何话语都诉诸于一种在视域中作为图像而被给予说话者的指称。当然，图像的秘密并不在空间经验中，它是一个无意识母型的产物，而母型“并非一种语言活动，不是一种语言结构，不是一棵话语树”。(ibid p 327)母型意味着不可交流，孕育着图像和形式，而话语可能要加以言说的仅仅是由母型产生的那些形式和图像。母型处在那超越可知者而完全被差异所支配的空间中，图形世界的秘密就是违犯构成话语的那些间距，违犯构成表象的那些间距。

在利奥塔看来，“眼”是“力”，是能折叠文本而使之成为一部作品的能量。“眼”将恢复原本固定在画框内而显得僵硬和毫无生气的画的运动和生命。然而，整个西方理性却把无意识变成冰冷的话语而忽视了“力”这种作为形式和差异的能量，其结果就是西方理性在梦想艺术的同时扼杀了艺术。西方理性让语言无处不在，遍布四周，实施对可感物和快感的抑制，“这非但根本没有与形而上学决裂，反而是形而上学的完成”。(ibid p 14)

传统理性话语的形而上学还遮蔽真相。利奥塔追随尼采质疑话语的构型，质疑参照共同规则的对话过程，断定这一西方社会随着苏格拉底而获得的作为其特有话语立场的形态，恰好意味着真相的终结，而唯有凸显力、差异和形式的图形才能让人获得真相。利奥塔认同弗洛伊德的真相观，即真相从不出现在人们期待它出现的场所，真相似乎出现在话语的表层，但实际上真相从不经由意指的话语。“真相显现为一种以意指和知识为尺度来衡量的谬误”。(ibid p 17)唯有把不可见者驱入视域从而扩大视线的感性图形表达才是真相。弗洛伊德让利奥塔懂得，唯有表达出“力”、差异和能量的图形才是真实的。

二、梅洛—庞蒂现象学的缺憾

真相与理性话语的统一性无缘。利奥塔与福柯一样批判传统哲学探寻统一性、第一因和起源，只不过福柯是从尼采强力意志那里吸取灵感，利奥塔则是诉诸于弗洛伊德的欲望驱力。“我们已抛弃了统一性的狂热，已抛弃了在某种统一的话语中提供第一因的狂热，已抛弃了起源的幻想。”(ibid p 18)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阻止多样性、差异性被统一起来。由于既不存在源初，也不存在统一的境域，哲学家们就不应该构思和阐发一种关于统一性的理论。

虽然利奥塔和梅洛—庞蒂都拒斥导源于大写理性的“原初”和“统一”而关注“侧面性”，但梅洛—庞蒂谈论的是生存的侧面性、主体的侧面性，利奥塔则谈论无意识或表达的侧面性。“这个侧面性就是差异或深度。”(ibid p 19)鉴于梅洛—庞蒂的主体的侧面性几乎就是主体的统一性而屈服于统一性话语这一幻想，以及其视觉格式塔是二次理性化的成果，利奥塔要让图形空间始终凭其具有差异性的线条和变动不居的侧面来捍卫自身：因为侧面、差异和深度远远超过一种反思所具有的想要在自己的语言中意指图形的力量。显然，在有效批判理性话语及其统一性这个问题上，利奥塔认同的是弗洛伊德、塞尚、马拉美、弗雷格，而非梅洛—庞蒂。

就近代哲学的语言意指把患者与被患者截然分开而言，利奥塔与梅洛—庞蒂都设法用动作的意义来对抗语言的意指^①。但鉴于梅洛—庞蒂的“动作”，作为对某种经验的感觉，感觉者与被感觉者在

^① 意义与意指相对峙。若意义在场，意指就不在场。意指要捕获意义，意义也就被驱逐到新的言语动作的边缘。于是，“建构意义从来都只是解构意指”。(Lyotard 1971 p 19)

其中融合成一个有机和历时的整体，以至于该动作属于并非压抑对象而是进行构造的主体这样的无意识状态（inconscience），利奥塔要拆解开表面上似乎相互包容以共同对立于语言意指的力比多意义与可感意义，并断定其随着现象学面具不是移向无人曾看见也无人将看见的无意识（inconscient）的脸上，而是移向欲望的面具上。这样，现象学就没落了（Lyotard 1971, p 20），知觉的重要性也失落了。

虽然利奥塔和梅洛-庞蒂都批判传统理智论太过注重理智反省方法而贬低甚至忽视感性知觉，但利奥塔对笛卡尔《屈光学》知性空间理论的读解却有别于梅洛-庞蒂。“这种盲人光学的功能实际是为了扫清视域所固有的异质性，以使得视域成为一个知性空间、一个‘有待听的空间’。”（ibid p 183）梅洛-庞蒂在《眼与心》中曾试图证明笛卡尔《屈光学》在原则上基于对生动的眼、对该眼之生成空间的运动性所作的排除，并设法用塞尚的感性化空间来排斥笛卡尔理性化的知觉空间，而利奥塔则在笛卡尔那里到处发现视觉主题、对作为被动性却又支撑着体系构成论题的“见”的激情。鉴于梅洛-庞蒂倡导身体的灵性化和心灵的肉身化，来反对和避免笛卡尔那里被体验空间与思想空间的分离，利奥塔批评梅洛-庞蒂对可见者的经验作了优先的、排他的参照，并简单地把这种经验与可见者的知性活动对立起来。利奥塔认为可见者的本质并不是经验的对象，因为可见者的差异这一特征恰恰是在关于知性活动本身的理论中重现的。（ibid pp 182-183）

梅洛-庞蒂批评传统理智论的反省分析僵硬地把世界固定在铁板一块的抽象意识之中，而无视感性知觉的实际活动；然而，这种批评在利奥塔看来主要是认识论上的批评而并不具有革命性意义。确如梅洛-庞蒂所言，传统理性哲学对意义和空间所作的非连续的、逻辑的设想只可能错失可见者的所予（donnée）和给出活动（donation）。塞尚渴望圣维克多山不再是视野（vue）的对象，而是成为视觉领域（champ visuel）中的一个事件。但利奥塔批评梅洛-庞蒂“希望理解”却又“无法理解”塞尚的渴望。（ibid p 21）虽然梅洛-庞蒂最后诉诸被动性概念以捕捉所予者的事件性，但“这一被动性还是被看做进行瞄向的主体的假定，作为该主体与对象的超越关系中被预先假定的内在性”（ibid）。利奥塔批评梅洛-庞蒂的主体从单数的“我”过渡到匿名的复数的“人们”并不成功。匿名状态只能解释事件被吸收、接收、觉察、纳入世界之中，却不能解释视域有事件存在这一事实，“事件之谜依然未能解开”。（ibid）事件之谜的解开，取决于探索给出活动，而无关于所予者匿名与否。“现象学无法达到给出活动，这是因为它忠实于西方哲学传统，因而仍然是一种对认识的思考，并且这样一种思考的功能就是吸纳事件，将他者（Autre）回收回到同者（Même）。”（ibid）

鉴于梅洛-庞蒂把在意指领域中表现出来的作为骚动的事件仅仅归于己身（corps propre），并设法在灵性身体（corps animé）^①之生命的沉默基础上构建一种异教哲学，利奥塔断言梅洛-庞蒂的“异教主义仍然被固定在知识的问题域中”（ibid p 22），造就了一种有关灵性身体的精巧哲学。梅洛-庞蒂的“眼”所“看”的，其实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身体对被看之物的距离性接纳。身体是能看者，精神与身体融为一体。如果说理性主义者认为只有精神之眼才能看到作品的深度，并否认现实世界的可见性，那么，梅洛-庞蒂则认为作品的深度源自于身体的感官体验，并且每个人通过自己的身体而与他人共处的那个真实世界就是可见世界。利奥塔却否认身体能对抗语言，否认身体是事件的场所，因为作为骚动的事件不仅对抗被吐露为话语的知识，而且还能动摇关于己身的准理解。“这并不是身体扰乱语言，而是其他东西既能扰乱身体又能扰乱语言。把身体接受为事件的场所，这是为了掩盖欲望而担负的由柏拉图-基督教传统实施的防御性移置和广泛理性化。”（ibid）利奥塔认为事件只

① 这也就是梅洛-庞蒂所谓的“肉”（chair），是进行感知、运动、欲求和受苦的身体；它也指能见者身体（corps voyant）与可见者世界（monde visible）的存在统一体。

能被安置在由欲望开启的作为给出活动的选定场所的空洞空间之中。事件并不来自人们期待于它的地方，因为欲望在自身中有对其自身的拒斥；也并不存在事件的拥护者和代理人，因为给出活动剥夺了我们。无论是话语还是身体，都不能使得可见者的给出活动成为可能，倒反而允许对所予者进行确认或理解。利奥塔对塞尚的读解不同于梅洛-庞蒂：“山脉不出现在被眼睛所期待之处”，塞尚的这一祈祷“既不将可见者与语言的我-你（Je-Tu）相联系，也不将可见者与知觉的人们（On）相联系，而是与欲望的大写本我相联系”。（Lyotard 1971, p 22）欲望的大写本我并不是指欲望的即刻图形，而是指欲望的运作。虽然都批判传统理性主义和表象主义，但利奥塔与梅洛-庞蒂的关注领域不同，前者关注欲望的本我领域，而后者则关注知觉的人们的领域。

梅洛-庞蒂把可感物称作交错配列（chiasm e）的场所，是我与他者、见者（voyant）与可见者（visible）、内部与外部并未发生分化的场所；这个场所首先不是被听到的言语，这个场所衍生出了见者与可见者这两个伦理生活所谈论的不平衡的侧面。利奥塔指出梅洛-庞蒂的解决方法是有问题的：“在没有通过现象学还原来粉碎这个不平衡，没有通过先验领域的内在性来克服外在性的情况下，就径直深入到这个作为起源的交错配列了，并为此而发现一种语言来指明何谓意指活动的根基。”（ibid p 11）梅洛-庞蒂只有把言语与动作混合在一起才能使语言与语言所言说的交错配列的空间保持同体同在。可是，一旦梅洛-庞蒂混合了言语与行动，就难免不步黑格尔的后尘：“挑动感性确定性说自己而又不陷入不确定性的焦虑之中”（ibid）。鉴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通过逻各斯语言中介活动最终断定感性确定性的不确定性，利奥塔断定黑格尔的囿于语义学平面图表的语言言说活动，无法认真对待需要在空间图形形式加以指出和显明的具有深度的可感者。黑格尔把可感者与有意义者分隔开来，幻想着让“见”消失在“说”之中，强调“说”优于“见”。利奥塔要向黑格尔式的话语的自负和蛮横发难，确信语言活动无法认真对待与欲望同时构成的可感者。“因为黑格尔第一个仅仅将象征符号设想成是供人思考的，第一个将象征符号尤其看做一个有待超越的时刻，说到底，他仅仅忽视了去看象征符号而已，他想要倾听象征符号沉默的声音”。（ibid p 12）虽然现象学家把“见”这种产生广延、深度、图形的运动性经验当作优先的描述对象，但他们的“见”这种经验是属于先验领域的原初的无意识经验，而无关于欲望的运作。

由于最具哲学性的言语是那些最有力地向存在开放并动摇明证性的言语，而并不必然是那些将封闭自己说出的内容的言语，因而梅洛-庞蒂的蕴藏着欲望能量迸发的属于身体动作的运动性就要敲打执迷于封闭的言语的理性（被言说的言语），旨在于其中产生梦、诗和图形的“无序”，旨在实际上在其中揭示出某种介于爱欲-死亡与爱欲-现实、可变与不可变、图形与话语之间的存在之不稳定、不可能的“秩序”。（ibid p 56）虽然利奥塔与梅洛-庞蒂都批判传统哲学的理性话语，但他们的批判方式和立足点却有差异。梅洛-庞蒂立足于能知觉、意向和表达的现象学身体理论，以模糊、弄混感性与理性、我与他人之间对立的方式来超越传统经验论和理智论，而利奥塔则立足于弗洛伊德的图像欲望理论，以在欲望的变化之中来衔接文字空间和图形空间的方式来批判理性形而上学。由此便可理解，为何利奥塔要消除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这样一种天真做法：它在重视语言时并未考虑到使语言活动成为可能并作为语言活动场所和规则的另一结构前意识。

三、弗洛伊德主义

利奥塔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让“见”消失在“说”之中，不能像胡塞尔和梅洛-庞蒂那样把“见”当作属于先验领域的原初的无意识经验，而是要像弗洛伊德那样在“说”中看到“见”，要像弗洛伊德那样把语言的空间与图形的空间衔接起来。这就是利奥塔的《话语、图形》在批判传统理

性形而上学时所表现出来的弗洛伊德主义立场。

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这三位“怀疑大师”，为20世纪法国哲学整体发展提供了哲学话题和思想养料。弗洛伊德理论是许多20世纪法国哲学家用来批判近代理性主义意识哲学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福柯、德里达、拉康、德勒兹、利科、利奥塔无不如此，只是程度不一而已。利奥塔的《话语，图形》诉诸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思想来阐发图形与话语的关系问题，具有较激进的弗洛伊德主义倾向。利奥塔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欲望理论不仅当作评判胡塞尔现象学、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和形式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尺度，而且也当作他据以奠基其欲望哲学和艺术哲学的理论基石。

梅洛-庞蒂认为，我们通过知觉就可感知到“我”通过“我的身体”此时此地处于此世而与他人发生关联，现象世界是“处于初生状态的‘我-他人-事物’系统”。(Merleau-Ponty, p 69)而利奥塔并不认同梅洛-庞蒂对“眼”所做的知觉现象学的阐明，他要降低“我-他人-事物”这个现象知觉系统的重要性。梅洛-庞蒂也谈“眼”，却是把“眼”与“精神”放置在一起来谈，谈论可见与不可见。“眼”是美学的可见者，而“精神”则是哲学的不可见者。利奥塔致力于把话语领域中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意指 (signification) 与指明 (désignation) 区分开来，并强调视觉空间的属性截然不同于语言学意指的属性，却并不信奉梅洛-庞蒂所创立的缺乏欲望维度的可见者的现象学。因为在利奥塔看来，从视野 (vue) 过渡到视觉 (vision)，从世界过渡到幻想，并去构成对象，这不再是话语注视的责任，而是欲望实现的事了。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图形有着不同的理解。利奥塔把图形看作是幻想母型，并坚信弗洛伊德理论战胜了胡塞尔理论。图形“也不再仅仅是出场或表象的图像，而是场景化的形式，甚至是话语的形式，并且更为深刻的是幻想母型。弗洛伊德课程战胜了胡塞尔课程”。(Lyotard 1971, p 20) 而梅洛-庞蒂的身体知觉图形虽然超越了胡塞尔的意识意向，但其视觉格式塔理论却是二次理性化的成果，而未能诉诸于欲望的中介。

绘画须经由眼来通达真实，并记录、展示画作的起源和秘密。“眼”这个可见者恰恰与欲望密切相关。可感者与欲望同时构成并从欲望那里获得深度。弗洛伊德将可见的、想象的和可说的东西的构成，与欲望对象的消失和再现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在弗洛伊德那里并且从弗洛伊德开始，被要求的中介就是欲望的中介，因为正是与欲望相联系的缺乏 (manque) 才成了所有否定因素的轴心。”(ibid p 29) 弗洛伊德不再把指称 (Bedeutung) 空间看做一种简单的纯理论距离，而是看做作为欲望象征的眼的活动空间，是对同源体一分为二。“欲望区域为思想造窝并让思想栖居其中。对象经由一分为二而失落，又经由幻想而重现。”(ibid p 129) 利奥塔所聚焦的是这只不再处于话语边缘而是处于话语深处并紧盯图形空间的“眼”。

这是因为无论是意指及其主体空间，还是指明及其系统空间，都不能穷尽意义；只有作为欲望专属空间的图形空间才能穷尽意义，诗人和画家在欲望空间中不断与大写自我的文本作斗争。被置身于我们言语深处的图形，就像欲望活动在话语中所产生的扭曲效果之母型那样起作用。欲望区域是思想的温床并使思想安居其中。于是，在感觉图形与理性话语的关系问题上，利奥塔不仅要超越主体、主体性原则和主体哲学，而且还要超越系统、非主体性原则和非主体哲学。梦在图形中实现欲望，图形和欲望都不言说，都违反言语秩序。弗洛伊德发现“图形与欲望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契合”(ibid p 271)，并把梦的工作 (travail du rêve) 与话语优势地位对立起来，以对对象、形式和空间进行违犯的三种方式，图形至少两度与欲望相契合。(ibid p 279) 弗洛伊德所谈的“扭曲”以及“梦的工作”所实施的四个运作 (“凝缩”、“移置”、“形象性”、“二次加工”)，都有赖于一种被假设记录着文本的感性造型领域，而根本不依赖于话语意指所处的那种空间性。(ibid p 243) 因为“梦的工作不思想”。(ibid p 245) 睡眠主体实施的梦的工作在图形中实现欲望，梦的工作就是图形要素实施

的力量在语言活动上产生的效果，它阻止人们去听，而是让人们去见。

利奥塔把弗洛伊德解读为阐发破坏性欲望和革命性欲望的欲望哲学家。图形最能表达欲望，而抽象话语却只能冻结欲望。虽然利奥塔区分图形与话语并强调图形的重要性，这与德里达在书写与言语的区分中凸显书写的重要性、与福柯在癫狂与理性的区分下让癫狂尽情呐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偏执于弗洛伊德的两种欲望理论，利奥塔似乎不恰当地对梅洛-庞蒂基于知觉首要性的主体间性存在论作了主客体关系的认识论读解，甚至于因把流动的充满力量的欲望图像与凝固的毫无生机的理性话语截然对立起来，而忽视了欲望图像要利用主体本身这一事实性质。

在西方哲学史上，二元分裂的萌芽见诸于柏拉图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的对立。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智、书写与言语、图形与话语、看与说、视觉与语词、所指与能指、现象与本质、特殊与普遍等等，都是哲学史上二元分裂的关系项，前一个往往受褒扬，后一个则受贬损。20世纪法国哲学家解决这种二元分裂的策略并不是颠倒原先的尊卑秩序，而是探寻这两个项尚未分裂之前的原初整体。同样，利奥塔关于图形与话语的看法也并不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只是颠倒了原有两个分裂项主次秩序的新的二元分裂。在批判西方传统哲学二元分裂这个问题上，鉴于福柯试图探明在思想史上癫狂与理性对话合奏时主体的真相，德里达设法在原初痕迹、原初书写的基础上来描述书写与言语尚不分离时的状态，利科解释“作为他者的自身”而宣称能在笛卡尔的受颂扬的“我思”与被尼采宣告为堕落的“我思”之间保持不偏不倚（Ricoeur, p. 35），利奥塔倡导一种在话语中见图像、在“说”中有“见”并且“看”高于“听”的审美感性图画哲学。

《话语，图形》倾向于批判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理性话语对统一性、同一性和有效性的普遍妄求，而倡导一种基于弗洛伊德思想的颂扬多样性、流动性和差异性的欲望哲学。《力比多经济》把社会和世界看作是利用和释放着欲望、能量和情感的力比多系统，从弗洛伊德式的既肯定又否定的欲望哲学开始飘向尼采式的完全肯定的欲望哲学。从《话语，图形》主张欲望是思想的温床，到《力比多经济》强调思想并不先于并通常逃避那产生于力比多欲望能量的“不可共存性”（Lyotard 1974 p. 23），我们不难断定利奥塔的早期思想实际上都是一种基于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理论之上的欲望哲学。利奥塔早期思想的弗洛伊德主义易被指责为天真的自然主义和素朴的经验主义，这促使利奥塔思想在后来发生了语言学转向^①和伦理学转向，开始飘离弗洛伊德主义，用维特根斯坦语言理论来取代弗洛伊德的欲望话语，用歧异语言政治来取代微观欲望政治。利奥塔在远离近现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时，却又陷入了激进自然主义和极端经验主义。这里的问题在于，极端经验主义如同极端理性主义一样，都难以真正在感性与理性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参考文献

- Cabriel P., 1946, *L'œil écout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Lyotard Jean-François 1971, *Discours figure*, Paris Klincksieck
 1974, *Économie libidinal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Merleau-Ponty Maurice, 1945,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Ricoeur Paul 1990, *Soi-même comme un autr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创新基地）

责任编辑：辛木

The Inherent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s

Liu Lifu Hu Yo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s with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evolution have contained various virtues and standards. What a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ll these numerous ethical idea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of ontology-practice, puts forward an inherent structural model of two-dimensions-four-sides-three-levels, which contributes to a new orien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oral ideas. Specifically, the “two dimensions” mean man’s individual and social existence, the “four sides” embody the base Noun, noun, realm Noun, noun, knowing work and practice work, while the “three levels” mean the ontological level formed by the basic categories of Way, Character, Great and Holy, the practical level constituted by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Benevolence and Ceremony, and the ontological-practical level made up by the radical principles of Earnestness, Brightness, Wisdom and True.

Figure and Discourse Lyotard’s Freudianism

Mo Weimin

In his dissertation *Discourse, Figure* based on Freudianism, Lyotard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 of figure and discourse, emphasizing that the visible figure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easonable discourses, and declaring the decline of Husserlian phenomenology and Merleau-Pontian phenomenology, in order to reject modern philosophers’ rationalistic terrorism that pursues unanimity and unity, and then paves the way for his explanation of his postmodernist doctrines in *Libidinal Economy*,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nd *The Differend*. However, Lyotard walks into the radical naturalism and naive empiricism while moving away from modern philosophy’s rationalistic metaphysics.

Two Dimensions in the Analysis of Emergence

Li Quanmin

The concept of emergence is receiving close attention and intense debates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and scie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ur main types of emergence based on the subject-matter and time dimensions. It argues that emergent phenomena are all dependent on the choice of space-time scale, and so the space-time scale selected is relative; the essence of emergence is the incompressibility of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system. By the epistemological or practical needs, we can construct different concepts or theories to explain the emergent properties, the micro-constitution, or the different evaluative states of a system, but the dependence of emergence on space-time scale and the middling evolution not only makes these concepts or theories irreducible, but causes the knowledge based on the original states of these emergent phenomena can’t predict their emergence in principle also.

Euthanasia, Suicide, and Death with Dignity

Zhai Zhenming Han Chen-kai

The issue of death with dignity has been usually understood in the scope of the issues of euthanasia. But properly construed, the concept of dignity, when applied to the issue of death, has its own scope that does not have a particular connection to the concept of euthanasia. Dignity pertains primarily to a deontological concern of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thus is independent of the utilitarian concern of reducing pain and suffering, and so dignity defense can justify not only some forms of life-ending of the “terminally ill” in a hospital setting, but also some cases of suicide apart from any medical consideration.